

漕运与河下

杜涛

河下位于淮安城西北五里，东临末口，明代至清道光盐改票前是淮北盐商聚居地，也是淮安重要的商业、金融业的中心。隋唐之前，该地不在运河线上，亦无形成市镇的记载，直到北宋时因故沙河的开通，河下始位于淮河、运河之间，成为南北交通必经之处，形成满浦镇（坊）。

隋唐大运河的汴河和邗沟之间由200余里长的淮河联接。淮河河面宽阔，有风涛之险，特别是末口西三十里长的山阳湾，“水势湍悍，运舟所过，多罹覆溺。”唐代皇甫冉《洪泽馆》诗称：“年年淮水上，行客不胜悲”。北宋初，淮河上年损失漕船达170艘。北宋雍熙中（984—987），淮南转运使乔维岳开放沙河，自末口至淮阴磨盘口，长40里，以避淮河山阳湾之险。至此，运河乃经过今河下所处的位置。

故沙河上置有“二斗门”。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维岳规度开放沙湖，自末口至淮阴磨盘口，凡四十里。又建安北至淮邀总五堰，运舟十纲上下，其重载者皆卸粮而过，舟坏粮失，率常有之，纲卒傍缘为奸，多所侵盗。维岳乃命创二斗门于西河第三堰，二门相逾五十步，覆以屋宇，设悬门蓄水，俟故沙湖平，乃泄之。建横桥于岸，筑土累石，以固其趾。自是，尽革其弊，而运舟往来无滞矣。

其中“俟故沙湖平，乃泄之”一句，《宋史·乔维岳传》作“俟潮平乃泄之”。因《宋史》记载的模糊，故对于“二斗门”的位置有位于楚州淮阴县、位于仪征的不同说法。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明确记为“俟故沙湖平，乃泄之”，就完全否定位于仪征的说法。故沙湖当即管家湖，乔维岳在故沙湖中开出运道，当筑有堤岸，故名故沙河。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述详赡，史料价值极高。李焘编著此书的目的是写一部信史，留给后人。他在隆兴元年（1163）第一次的进书状中有着十分清楚的说明：

臣尝尽力史学，于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恨学士大夫，各信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史，纷错难言……臣辄发愤讨论，使众说咸会于一。

李焘于正史、实录、政书之外，凡家录、野记，广征博采，校其同异，订其疑误，考证详慎。作者本着“宁失于繁，无失于略”的原则，凡记载不同者，则两存是说，时附己见，以注文标出。《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也受到了当时宋孝宗的高度重视。

日本僧人成寻（1011—1081）《参天台五台山记》有经过二斗门的记载：

熙宁五年（1072）九月十六日“戌时，过八十里，至楚州城门宿”。十七日“巳时，出船，回州城，至闸头。”筑城南北九里，三百步”云云，至于泗州二百里。巳时，过十里，至闸头，依潮干，不开水闸……戌时，以潮生，开水闸，先入船百余只，其间经一时。亥时，出船，依不开第二水门，船在门内宿”。十八日“终日在闸头市前。戌时，开水闸，出船。即得顺风，上帆，并牵纲手。寅一刻（寅时约为3—5时，“一刻”约15分钟），过六十里，至楚州淮阴县新闸驻船”。

据此记载，从楚州城南“回州城”，即环绕州城，过十里至闸头，又过六十里至淮阴，二斗门船闸的位置在今河下附近。

二斗门船闸有两道闸门，过闸一次需耗时一天，一次过船百艘以上。故沙河在淮阴磨盘

口方与淮河相通，文中的“潮”当指经船闸进出水的机关调节的水位。其运作原理与今天的船闸相同，即先打开船闸一端闸门，待闸室内水面与河道水面平，船只进入闸室，关上已开的闸门，再开另一端闸门，待闸室内的水面与下一段河道水面平，船出闸室至下段河道。据《中国水利史稿》论述，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船闸。百度百科中“船闸”“复闸”词条亦均以宋代楚州二斗门为始祖，称“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西河闸，是现代船闸的雏型”。

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记其过闸时“终日在闸头市前”。因地处要冲，船只过闸要在此停留，故而闸前的集市规模较大，商业兴隆，自然就形成市镇。北宋著名现实主义诗人，世称宛陵先生的梅尧臣（1002—1060）有《入满浦》诗：

马头挽岸斗，燕尾泊船齐。
风送寒潮急，云藏晚日低。

逢人多楚语，问客煮吴鸡。

难觅枚皋宅，苍葭处处迷。

《宋史·河渠志》记载，宣和二年（1120）向子諲建议“于北神相近作一坝，权闭满浦闸，复朝宗闸”。南宋楼钥《观文殿学士钱公行状》记，隆兴二年（1164）钱礼“塞楚州满浦闸”。从位置来看，满浦闸应即“二斗门”的正式名称。从满浦镇的形成来看，完全是因为漕运。

元代时满浦仍是山阳县的一个重要镇市。《元史·顺帝本纪》：元统二年（1334）六月“戊午，淮河涨，淮安路山阳县满浦、清冈等处民畜房舍多漂溺”，《续文献通考》卷六十四记元代设有满浦仓大使，正八品。正德《淮安府志》：

山阳县学旧建于满浦坊米市巷县尉司基地，元至元间，知县达鲁花赤哈刺迁于旧酒库桥南隙地，即今之西新仓地，至正间，毁于兵。国朝洪武三年，知县罗传道以察院西旧蒙古学草创今学。

元至元前满浦曾为山阳县学所在地，具体位置为“米市巷县尉司基”。县尉是一县内主管治安的佐贰官，明废，米市巷地名今无存，从此名中亦可见其时满浦坊商业发达，也是山阳县的一个文化、政治中心。

明初时满浦坊有满浦驿、满浦坝，均见于《大明会典》。淮安府税课司亦驻于满浦坊，正德《淮安府志》：淮安府“税课司旧在新城北辰坊，洪武二十年（1387），大使倪英申准迁于新城西门外满浦坊”。明永乐时，平江伯、漕运总兵陈瑄在满浦北黄河边建有矶嘴。《禹贡锥指》卷十三，袁黄曰：“至淮河入海之处，平旷无山，而海沙逆上，尤易壅塞。陈平江就山阳之满浦坊（在淮安府城西北四里）累石为山，蜿蜒千尺，即古锯牙遗制。水得翻腾踊跃以入海，俗谓之矶嘴，取相激而名。”“矶嘴之制，下布七星桩，桩上甃以石，石有笋，笋相人，缝有碇，碇三昧，灌以糯米汁，砌以油灰，长千尺。袁氏以为陈平江所创，或云天顺间遣都水郎于满浦坊作石锯牙，未知孰是。矶嘴为治河之要，万历初漫入水中，微露形迹。”

明永乐十三年（1415），平江伯陈瑄创办了全国规模最大的清江漕船厂，河下作为商业中心，成为造船物资的集散地，“钉、铁、绳、篷，百货骈集”（《淮安河下志》卷一《疆域》），今河下有钉铁巷、打铜巷、竹巷、绳巷等街巷名称，皆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

邹屏为淮安灾民请命

刘国璋



邹屏

1946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中版）第一版上刊登了一篇近2000字的文章，题目是《为淮安灾民请命》，作者邹屏。人们看到这篇文章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共鸣，并纷纷行动起来为救灾出力。苏皖边区工作人员喊出“千人省一口，饥民得一斗”口号，每人每天节约二两粮食长达90天。

邹屏曾用名周泉森，是河南舞阳（现舞钢市）人。14岁入党，17岁调任中共漯河中心县委委员兼共青团中心县委书记，21岁任舞阳县委书记，同年任豫中7个县特工委书记。后来随八路军南下，转战数千里，来到苏北，负责开辟阜东抗日根据地。1944年3月调任中共淮安县委书记兼县总队政委。

他在淮安时，有一个口头禅，就是：“为了群众，联系群众，依靠群众，通过群众。”因此他一到淮安，就深入群众，投入到紧张工作中去。在他的日记中曾写到：他头一天到淮安报到，和县领导人交谈了解情况，第二天就组织工作队，第三天就扎到泾口区蛇峰村，和群众一起劳动谈心，搞调查，做笔记，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一干就是20多天。在他努力下，淮安各项工作都取得好成绩。

但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各项工作顺风顺水时，1945年却遇到了多种自然灾害，夏早秋淹，瘟疫流行，蝗虫四起，尤其是秋天的一场大水灾，到处一片白茫茫，到了收获之时，已所剩无几，灾民们过着极度艰难的生活。很多人家很少吃到稀饭和玉米粥了，先前锅里还下些玉米面煮胡萝卜，到了冬天，玉米面没有了，只能清水煮萝卜。再到了1946年春天，连萝卜也没有吃的，许多人民在饥饿线上嗷嗷待哺，邹屏心像火燎一样焦急和难受。

2月的一天，他骑着骡子，来到受灾最严重的复兴区。因为这个地区地势低洼，只要连续几天大雨，这里农田就要沉到水里。这个地方没什么富农，贫农占绝大多数。1945年秋季这场大水灾，由于农作物淹在水里时间长，产量与往年相比，只能收到一两层，少数田块连种子也收不起来。

他在复兴区，看到到处是荒凉景象。断

墙残垣随处可见，树木歪斜着躯干，寒风吹起一阵阵尘土。墙壁和树干上的水渍告诉人们，这里数月前曾是一片汪洋。邹屏弯腰钻进裴联村头的一户丁头嘴子人家看到门旁的泥锅台边坐着一个穿得破烂不堪妇女，木然地望着进来的人，黑瘦的脸上很难分辨出她的实际年龄，邹屏看到锅里在冒着热气，就顺手揭开锅盖，一阵心酸顿时涌上心头，看到锅里煮的是少许枯山芋叶子。他就顺手提起一叶尝尝，没油没盐，苦涩难咽，便从自己的干粮袋里取出一块饼，放在锅盖上。那妇女只是嘴唇哆嗦了几下，什么也说不出来。当她站起来时，邹屏已默默地退出了丁头嘴子。

邹屏在复兴区，走遍了裴联村、史墩村、史荡村的每一户人家，对人口、缺粮等情况一项一项调查统计。结果是，这3个村共有692户，早在去年10月以前就没有吃的127户，眼下（2月份）断粮的564户，尚能维持的61户，能吃到麦收的54户，到收麦有余粮的13户。其中，已经泥门逃荒的197户。

为了掌握全县真实情况，回来后邹屏在班子会议上痛心地说：“现在有很多灾民难以生活下去，到处看到逃荒的人，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不然，要饿死人。”要求大家都到实际中去进行周密详细的调查。

这样很快一本本灾情账像万斤巨石装进了他的文件包里，压上他的心头。全县306个村，缺粮和半缺粮的281个。由此可见，灾情是多么严重啊！

面对如此巨大的缺粮数字，在他脑海里总是出现：大麦鹅子煮胡萝丝，豆沫子煮山芋叶子，水煮胡萝卜枯梗子，以及豆腐渣子、稻头皮子，看到山芋子都要眼红了；他眼前总是晃动着那些瘦弱的身影和失神而又求生的眼睛。

不仅没粮，还没草烧，有的人家甚至拆房子、扒猪棚子，找棍棒，破旧家具，刨树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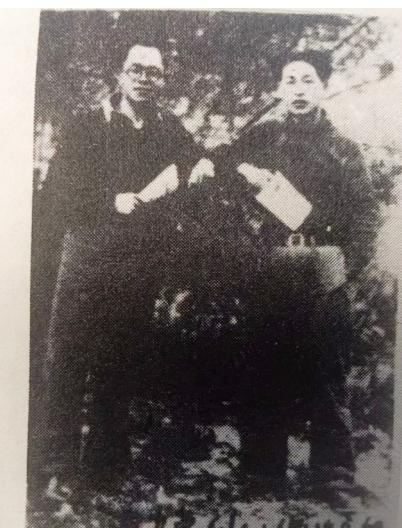
这一切，使他吃不香、睡不眠。

他召集县委和政府领导人想了多种办法，组织灾民打鱼、摸虾、卖油做生意、拾草根、挖野菜，帮助盐商推盐；发动妇女纺纱，并帮助解决原料与产品销售；及时发放种子、耕牛春荒贷款，开展富户互助，用最大的力量帮助灾民战胜灾荒，发展生产。

然而，这一切努力也只是杯水车薪。他想，要帮助灾民解决更多困难，光靠政府是不行的，只有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共同来做这个救灾工作。

一天深夜里，当人们进入梦境时，他怎么也睡不着觉，50万灾民的困苦又在他脑海里一幕幕闪过。于是，再也睡不住

▶ 邹屏（左）与《淮安党刊》
编辑曹凤合影



了，便起身披上衣服，点起了小油灯，在微弱的灯光下挥毫疾书：“我要为淮安50万灾民请命。我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共同来做这个救灾工作。”“同志们，你们能够节省一些粮食吗？省一口粮，救一条命；出一块钱，救一条命。想想这些处在饥饿和寒冷中的人们吧！大家努力，救灾灾民！”

第二天早上，他又在机关干部会议上要求：每人每天节省4两（16两制）粮，并带头把自己的一条骡子卖掉，得2000元抗币，全部捐献给灾区人民。在他带动下，全县立即掀起有钱出钱、有粮出粮的热潮，使处于饥饿和寒冷之中的灾民们得到生的希望。

邹屏为淮安灾区人民请命已快80年了，淮安水利早就修好，再不受自然灾害折腾了，人民不再没吃没烧，早已过上幸福富裕的小康生活。但他那为淮安灾民请命之心依然熠熠生辉，永远印在淮安人民的心中。

▲ 邹屏（左）与县民兵总队部
总队长张洪山合影



瓜洲渡，一条运河联淮扬

王卫华



埭（即坝）引江水入埭济运的。

隋大业元年（605），隋炀帝开挖通济渠，开启了南北大运河的工程。其中一个重要的工程便是拓宽阳浦（即邗沟），大运河的主航道改由扬子津入长江。到了唐代中期，沙洲长大了，北边与陆地连接了起来。一时泥沙淤积，楚州（今淮安市淮安区）至扬州运河南端入江口扬子津已与瓜洲相连，阻断了扬子津出江口航道，江南漕船进入运河需绕道瓜洲沙尾，迂回60里，且易发生沉船事故，漕粮北运不畅。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刺史齐浣开挖伊娄河，南至瓜洲，北接淮扬运河，船只由润州的京口埭入江，渡过长江便至瓜洲，再由瓜洲渡入伊娄河，至扬州后入淮扬的里运河。至此，大运河入长江出现了两个运口——瓜洲运口和仪征运口并存的现象。自长江上游来船可由仪征附近运口入运，自江南运河来船则由瓜洲运口入运，交通十分便利。李白路过瓜洲看到此情形，写诗赞叹：“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

春秋时期，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伐齐国，争夺中原的霸权，开挖了邗沟。邗沟南起今天扬州以南的长江，北到今天淮安以北的淮河，当时邗沟北头就有了末口镇（今淮安市淮安区），但邗沟南端入长江的地点却在不断地变化。汉时，长江的水流下沙，在今天扬州市与镇江市间的长江中渐渐形成水下暗沙，在潮长潮落中时隐时现，宛如一只瓜漂在水中，这里被称为瓜洲。晋时，这里形成了长江中四面环水的瓜洲，洲上有了渔村和集镇。但在东晋时，邗沟南端是在广陵城西南60里处（今仪征）建欧阳

河方医药之祖”。鉴真和尚的瓜洲东渡，是高僧品格的坚韧，是大唐文化四处光大的光辉一页。

宋靖康元年（1126），金兵掳走徽、钦二帝，康王赵构在南京（今商丘）即帝位，这便是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宋高宗抵达扬州府，金兵追杀而来。宋高宗逃到瓜洲渡，扬州知府吕颐浩等在江边觅得一条小船，急急送高宗过江。宋高宗的瓜洲逃命，是北宋王朝腐败的必然，南宋屈辱的肇始。

明代文学家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写了一篇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在心上人国子监太学生李甲见金忘义转卖了自己时，杜十娘在瓜洲渡江面沉下的不仅是价值连城的百宝箱和自己美丽的胴体，而是对吃人社会的决绝抗争。

1910年，12岁的周恩来随着三伯父周贻谦从淮安运河码头上船，船到瓜洲渡，过江到镇江，乘船到上海，再转道赴东北，那是他大鹏展翅，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开始……



瓜洲古渡公园 王卫华 摄